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4.005

全球史路径下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思考

郭琳,张放

(上海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通过对思想、信息资源等要素流通性的强调并经由时间、空间、资本三维重构,全球史路径被赋予建构性与批判性特征。全球史路径能够给毛泽东研究带来两个方面的启发:其一是从文本类型与传播渠道重新审视毛泽东思想传播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其二是对毛泽东思想世界影响的深层原因进行真理性揭示。在全球史路径下深化毛泽东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厘清毛泽东思想流动传播的脉络,对海外既有研究形成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挖掘毛泽东思想中的普遍性资源,结合地方语境呈现价值关怀,在此基础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模式。

关键词:全球史路径;毛泽东研究;海外传播;世界影响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4-0031-07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人。美国学者威尔逊(Dick Wilson)认为,毛泽东“在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来自西方传统之外却有如此影响的第一人”^①。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本的高速融合使得毛泽东的影响早已超越了马列主义传统,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政治景观。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是现代世界最为重要和最为复杂的政治推动力之一”,是“一条理解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主要线索”^②。

鉴于毛泽东的世界影响与当代价值,如何进一步深化毛泽东研究成为当务之急。传统研究范式受制于政党与国家框架,虽能凸显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却难以呈现毛泽东的世界影响和意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全球史研究的兴起为突破视角局限提供了新可能^③。作者旨在从时间、空间、资本三重维度批判性反思全球史路径,探索新视角下全球史路径与毛泽东研究结

合的可能性,力图呈现毛泽东思想的世界影响力及其背后的价值原因,以促成有温度、有深度的中国话语。

一 对全球史路径的批判性反思

1997 年,西方学界开始尝试研究毛泽东思想在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和秘鲁等国家的影响,拉开了全球史路径下毛泽东研究的序幕^④。然而,西方学者大多囿于自身观念和文化,未能摆脱西方价值观主导的视野瓶颈,对全球史路径的理解有失偏颇,以此展开的关于毛泽东世界影响的讨论势必带有片面性。在呈现全球史路径对于丰富毛泽东研究的可能性之前,必须先借助史学理论对该路径进行批判性反思。

历史学中先后存在三种时间处理模式:(1)将希腊罗马古典时代视为范例的后置时间模式;(2)以社会进化论和历史目的论为据的前置时间模式;(3)在全球史实践基础上的“整体地球时

收稿日期:2023-05-28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21BKS005);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22JDSZK034)

作者简介:郭琳(1984—),女,上海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世界史和政治思想史研究。

①Dick Wilson ed.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vii.

②Julia Lovell. *Maoism: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9, p.7.

③林恩·亨特:《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赵辉兵译,大象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5 页。

④阿里夫·德里克,保罗·希利,尼克·奈特:《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张放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13—320 页。

间”(whole earth time)模式^①。显然,全球史路径的出现标志着一种理解时间的新方式。全球史将关注对象“扩展到更大的地理区域、更长的时间维度以及更广泛的人类和自然现象”,尤其关注“不同地区、现象和时期之间的动态与互动关系”,继而形成一种“广阔范围内的互动研究”^②。

流动性无疑是全球史路径最显著的特征。全球史“就是交流、联结、混合不断反复的历史”^③。全球史主要关注“那些超越领土疆界的思想、信息、资本、物质和人员的流动”^④，“以跨地区、跨国家、跨文化、跨民族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从广阔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⑤。如曼宁(Patrick Manning)所言,“全球化带来了一种革命性的意识:人们认识到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问题可以在一个跨越地域、时期和主题的框架中进行有效地分析”^⑥。

然而,如果将全球史路径化约为各种角色、要素和力量跨越界限的交流互动,恐怕仅触及到该路径的表层,更有陷入逻辑预设网之嫌。事实上,全球史的萌发与以西方为中心的进步主义心态密不可分。全球史路径的奠基之作《西方的兴起》,尽管勾勒出几千年来“欧亚大陆生存圈”中各个文明彼此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影响,却暗含西方与非西方二元对立的隐匿预设,将西方之外的地区视为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的受益者。作者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在该书首版25年后的回顾中也承认,该书契合了美国战后因先进技术和巨大财富积累而形成的一种乐观态度,“它的论述范围和概念是知识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并试图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类学者阐发的文化传播论的基础上理解全球历史”^⑦。

全球史路径最初在美国推行时,得到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⑧。从推动力量来看,全球史路径早期预设中

蕴含着一种以资本主义发展为标准的“进步—落后”二元对立线性时间观,将全球化视为自由主义理念推动下资本形态的新阶段。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西方文明裹挟着全球史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推广。针对西方学界主导下全球史路径存在的羁绊,本文试图从其内部寻求资源,通过批判性反思拓展新视角。

第一,重申时间的重要性。上述“整体地球时间”在实践中往往被理解为共时性和横向空间感,对时空的过度倚重导致忽视了纵向的历时性过程。不同的时间观代表着对历史叙事的重组,“不同的时间框架适用于不同问题,也形塑了它们给出的答案”^⑨。将历时性与共时性同时引入全球史路径,不仅能够洞悉各种要素水平流动的过程,同时还能纵向分析这一过程的持续性影响及其后果,进而为深入评估互动交流提供保障。此外,两种不同的时间观交汇还构成了全球化进程中新的时间形式,该形式使多重线索的汇聚成为可能——人们生活在地球村这一共同空间,但面临的生存问题和生命体验却具有“时间差”,呈现出多元化态势,这也为不同时空的类似现象提供了对比契机。

第二,与地方性形成关联。全球性与地方性看似相悖,但若将两者割裂,全球进程将失去根基。对地方性的强调可以有效抑制同质化叙事的冲动,凸显全球化进程中的复线结构。地方性的价值在于能够时刻提醒人们,“虽然近代早期世界受到诸多联系的形塑,但地方多样性依然丰富,或者说恰恰是这些联系丰富了地方多样性”^⑩。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 Dirlik)指出,只有承认区域和文化的差异性,全球性才有意义,“不能成为地方性的解决方案,就不可能是令人信服的全球解

①林·亨特:《历史学为什么重要》,李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7—118页。

②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田婧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05页。

③入江昭:《我们生活的时代》,王勇萍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

④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⑤刘文明:《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⑥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田婧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6页。

⑦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xvii页。

⑧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田婧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9页。

⑨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19页。

⑩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页。

决方案”^①。因此,凸显地方性和实践多元性有助于打破西方模式主导全球进程的神话叙事。

第三,围绕由资本—权力构成的主线展开叙事。全球化进程背后的动力是资本的无限扩张与蔓延,马克思主义传统对此作出了深刻的批判性分析。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组织借助海外市场扩大之机,不断拓展势力范围,就如何瓜分全球资源进行协议并形成“国际卡特尔”^②。列宁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垄断的阶段称为帝国主义,揭示了全球化进程背后的资本动力。在资本的输出与冲击下,个体与群体的命运不再完全由自己支配,全球空间也被资本权力严格区分为中心与边缘(core-peripheral)。因此,必须正确认知资本所扮演的角色,全球性“总是直接与利益、立场和权力关系挂钩,受制于知识生产的等级秩序”^③,故全球史路径要时刻警惕资本力量的侵蚀。

通过对时间、空间和资本的三维重构,全球史路径兼具建构性与批判性特征。该路径能够在流动与传播的新视角下挖掘传统视角容易忽视的现象,形成新的研究议题和叙事结构。对历时性、地方多元性的强调和对资本权力的揭示打破了西方中心一元发展模式的神话与线性文明等级观,为呈现地区实践的全球性提供新可能。全球史路径的新视角对于深化毛泽东研究,特别是对毛泽东世界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 加强毛泽东思想海外传播的研究

思想海外传播是洞察毛泽东世界影响的窗口。全球史路径下思想流动研究大体分为两类:思想本身(文本)和思想传播渠道(人物、媒体、机构等)。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影响的前提是海外受众能够接触、接受其思想,因此,毛泽东思想的对外宣传和海外传播是探索毛泽东世界影响的起点。此外,传播路径根据目标受众和主体内容而各具特征,通过个案研究和综合分析,可获悉各传播路径的影响范围和方式,用史实和细节呈现世界影响何以可能。

当前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海外传播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三方面:(1)着眼于译介,梳理毛泽东著作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机构组织;(2)梳理毛泽东著作对外传播和海外发行状况;(3)关注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载体。既有研究通过对部分史料以及历史线索的梳理,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奠定了基础,但若将之置于全球史路径下,对毛泽东著述和传播过程方面的研究则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 加强对毛泽东思想传播文本的研究

毛泽东著作翻译、海外发行是新中国外交史、出版史以及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道靓丽景观,是毛泽东思想在海外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载体,其关键性地位不言而喻。加强思想流动研究,应从毛泽东相关著述在海外译介传播的情况入手。

一方面,应注意国内出版的各种毛泽东文献在海外的传播情况。以往研究者主要聚焦于《毛泽东选集》,该文本在系统性、完整性方面无疑最能呈现毛泽东思想的全貌。然而,在海外传播并产生实际影响的文本远不止《毛泽东选集》。例如,毛泽东文章的外文单行本。单行本文章因其短小精致,更容易被海外受众接受阅读,在传播效果上并不逊于《毛泽东选集》。譬如对欧洲哲学界影响甚大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中国发行的毛泽东外文单行本中(外语种类、再版次数)均名列前茅;而在亚非拉地区产生积极影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外文单行本发行榜单中也位居前列^④。改革开放后,《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外交文选》等陆续由官方出版发行。随着中外人文交流日益频繁,这些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愈发受到海外读者以及毛泽东研究者的青睐,这些出版物的海外传播与利用情况亟需关注。

另一方面,应注意国外学者和友好人士编译出版的毛泽东文献。在早期传播中,共产国际、各国战时情报机构在译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国外也有许多团体自发翻译、发行毛泽东著作。比如,冰岛、挪威先后出版了《毛泽东

①阿里夫·德里克:《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胡大平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页。

②《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③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59页。

④张放,严丹:《毛泽东著述多语种版本的海外传播及利用》,《图书馆杂志》2021年第7期。

选集》;印度、古巴出版了毛泽东的系列重要文章^①;墨西哥格里哈尔博(Grijalbo)出版社用西班牙语出版了30种毛泽东著作^②。学术界编纂的毛泽东文献同样值得注意,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和《毛泽东补集》各10卷,以及施拉姆主编的多卷本《通向权力之路:革命时期毛泽东文献汇编》(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③。这些文献在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被频繁使用,国内研究者也时有提及,但它们的编纂过程、发行状况、文献价值却很少形成系统性研究。

(二) 加强对毛泽东思想传播渠道的研究

除了文本的直接传播,毛泽东思想还以多种渠道传播至海外。除了经常被提及的外宣刊物和国际广播之外,渠道研究至少可以从三方面加强。

首先,关注毛泽东本人在毛泽东思想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会见过大量外宾。这些外宾中不仅有国家政要,还包括学者、文人、青年学生和追求进步的革命者。毛泽东在与外宾交谈中反复提及的重要话题包括:(1)革命历史与理论。强调革命理论与地方经验相结合的重要性,鼓励其他国家根据具体国情走出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之路。(2)世界格局与秩序。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新兴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呼吁不要盲目依从资本主义国家。(3)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相关思考。这些内容通过外宾之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构成了毛泽东时代中国话语的基础。对毛泽东话语表达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如何建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话语与传播机制。

其次,关注在毛泽东思想海外传播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的组织和个人。例如,中国方面,外派的官员、留学生和援助者以各种方式——交谈、宣讲、发放毛泽东著作等——宣传毛泽东思想。海外方面,当地华人华侨会主动利用社会网络来宣

传毛泽东思想;来华留学生回国后很多都成为毛泽东思想和新中国建设成绩的宣传者^④;一些国际文化名流在亲历新中国的变化后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员^⑤。反映上述传播渠道的文献、史料在地市和高校档案馆、地方外事志、校志、厂志、当事人回忆录中均有涉及,为微观和细节研究提供了便捷。除此之外,一些海外研究者事实上也扮演着毛泽东思想宣传者的角色,他们通过译介、研究毛泽东思想,让更多人从正面了解到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国与世界的价值。这一群体的作用也有待在知识社会学脉络中进一步揭示。

最后,重视渠道内部的运转机制研究。以毛泽东时代负责对外宣传的中国外文局为例,其内部就如何进行对外宣传的问题长期存在争论。有留洋经历并在民国时期拥有市场化办报经验的人员,和成长于体制内的人员以及在新中国接受外语教育的人员之间存在观念分歧。到底应该以对象国受众为主、依循外国的表达习惯和文化心理,还是应该更突出中国的价值观念?由此导致外宣策略摇摆不定。当“留洋派”占据上风时,新闻几乎很少直接宣传毛泽东思想;当“体制派”掌管媒体时,又容易矫枉过正,使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过于政治化,影响海外受众的接受效果^⑥。显然,毛泽东思想的对外传播状况与渠道内部的观念张力和运作方式密切相关。如果仅仅关注文本而忽略渠道生产过程,就无法触及表象背后的深层动力。基本史料汇编和志书的陆续出版,如《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中国国际广播史料简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部门志》《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周年纪念文集》等,让我们获得从内部视角研究毛泽东思想传播的可能性。

三 毛泽东世界影响的深层动因

西方学界关于毛泽东世界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点:(1)毛泽东思想在政治层面的国际影

①参见廖盖隆名誉主编、李峰华主编:《毛泽东大典(传播·研究·影响卷)》,沈阳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②何明星:《毛泽东著作西班牙文版的翻译、出版与发行》,《中国出版》2020年第9期。

③张放:《西方毛泽东研究的路径演进》,《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④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页。

⑤康桥:《萨特和波伏娃:对新中国的观感》,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⑥张放:《〈北京周报〉的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8期。

响,包括毛泽东对欧美信奉马列主义政党的影响^①,以及亚非拉国家和地区政治领袖如何将毛泽东思想应用于地方革命与建设^②。(2)毛泽东思想在社会层面的国际影响,如美国黑人运动吸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探索肃清奴性文化的可能性^③。(3)毛泽东思想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如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左翼激进文化运动蔓延,青年群体通过毛泽东的话语和符号来反抗本国体制,释放不满与焦虑^④。

从上述三类研究不难发现,海外学者往往采取冲击—回应预设,默认毛泽东的世界影响源于其关于武装革命的思考。将毛泽东思想窄化为武装革命的思想,其影响自然就反映为指导第三世界武装推翻当政者,以及号召西方青年群体起来反抗现存秩序。尽管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海外最为激烈的影响形式,但绝非全部。该预设将施加影响的毛泽东思想和受影响的地方文化视为铁板一块的整体,试图通过一种“进步—落后”“现代—传统”的线性思维对两个整体之间的碰撞做出解读。其他社会只有吸收了现代性中诸如功能专业化以及世界“理性化”等根本特点,才能够作为社会而存在^⑤。依此标准,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语境的毛泽东思想显然是“落后”“保守”的产物。在一些海外学者看来,当这种“前现代”思想反作用于欧美现代社会时,只会造成混乱;当作用于等待解放和摆脱压迫的国家和地区时,也很难解决问题。只有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和制度才能完成救赎之重任,而毛泽东思想带来的影响注定只能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段插曲。毋庸置疑,基于该逻辑预设下的研究必然有失偏颇,如何加以纠偏是中国学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探索毛泽东世界范围内影响背后的深层原

因,必须先搞清楚海外受众如何阅读、援引、实践毛泽东著述和思想。为此,可以从两个层面着手:其一,海外受众援引毛泽东著作的初衷;其二,毛泽东思想吸引海外受众的深层思想特征。

海外援引毛泽东著作的情况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类型是对毛泽东进行符合援引者价值立场的学术研究。该类援引者会遵循自身价值观预设去分析毛泽东,但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批驳西方舆论中对毛泽东的片面认识。比如,《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的作者是一批持自由主义立场并受过区域研究训练的欧美学者,他们将毛泽东标签化后再逐一阐述,大量援引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文章,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认为毛泽东具有国际主义责任担当意识,锻造了包括集体主义、独立自主、铁的纪律、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维度的“无产阶级精神”^⑥。这种基于文本分析的判断完全有别于“专制者”等西方刻板认知,相对客观地勾勒了毛泽东形象。

第二种类型是将毛泽东思想与援引者自身知识体系相融合,以反思和批判社会问题。该类援引者会主动用这一来自异域的他者思想作为新的评判标尺。比如,思想家竹内好将战后日本知识分子被毛泽东思想吸引的原因归结为对“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向往,而这背后是对日本民族主体性缺失的失望与不满^⑦。竹内实则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主体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将之概述为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自觉意识的强调、对群众路线和集体主义的强调、对革命斗争永恒价值的强调,在此基础上反省日本近代史和军国主义史^⑧。同样,欧陆哲学家也从毛泽东著作中寻找批判性思想资源。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借鉴了毛泽东关于女性平等思想,试图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妇女解放运动实践引入西方语

①A. Belden Fields. *Trotskyism and Maois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utonomedia, Inc., 1988, pp. 88-102.

②Alexander C. Cook ed.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96.

③Robin D.G. Kelley, Betsy Esch. "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 *Souls*, 1999, 1(4): 6-41.

④小熊英二:『1968<上>:若者たちの叛乱とその背景』,新曜社2009年版,第294—297页。

⑤M. Meisner and R. Murphy eds. *The Mozartian Historian: Essays on the Works of Joseph R. Leven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6, p.102.

⑥Dick Wilson ed.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6.

⑦竹内好:「毛沢東評伝」,『中央公論』,1951, 66(4): 127-155.

⑧张放:《竹内实对毛泽东的研究》,《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1期。

境,以探索西方女权运动的出路^①。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在反复阅读《矛盾论》后,将毛泽东对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阐述界定为“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以此反思当时欧洲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的经济决定论和化约论倾向。巴迪欧(Alain Badiou)吸收了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尝试用制度化的群众路线反思西方选举民主中的弊端^②。

显然,第二种类型的研究更契合全球史路径的批判性特征,即对资本权力的揭示,以及对由资本推动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的警示。通过强调地方多样性,剖析资本逻辑和运作机制以探寻对抗资本力量的方案。鉴于此,毛泽东的世界影响绝不仅限于武装斗争理论,内嵌于毛泽东思想中的诸多批判性特征才是毛泽东世界影响的深层原因。诞生于中国近代救亡图存语境的毛泽东思想是对地方性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目光,也成为反思资本逻辑、资本文化全球化的重要智识资源。

第一,毛泽东思想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许多后发国家和地区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时,容易被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所吸引,试图依循资本逻辑、简单模仿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来实现自身发展,结果却陷入发展陷阱。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对外交往中反复强调,“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③。不仅如此,他还将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提高到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高度。毛泽东指出,独立自主不意味着盲目排外,而是要坚持开放,向外国学习。不过学习的目的是“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④,形成以本国传统与实践为基础的新文明。

毛泽东认为,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不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盲目崇拜、臣服或畏惧,必须破除这种迷信心态^⑤。只有“通过自己的路线、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手”^⑥才能真正取得成功。这对于苦苦探寻独立之路的被压迫者而言无疑具有启发价值,中国经验为他们摆脱资本附庸的地位提供了借鉴。

第二,毛泽东思想辩证地看待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改造之间的联系。毛泽东认为社会关系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生产关系,还包括精神层面的上层建筑。基于对矛盾关系的整体性思考,他认为社会关系改造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至关重要,不仅能够为生产力发展破除旧有社会关系,更为关键的是能够确保生产力发展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片面强调发展生产力,忽视人的精神塑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造,很容易陷入唯技术论之极端,而资本逻辑不加限制的发展结果便是如此。资本扩张使“世界各地人民在制度上被统一标准化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⑦,而毛泽东基于中国国情的地方性探索恰恰为反思和批判资本逻辑提供了武器。德里克指出,这是打破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垄断地位的尝试,这种价值关怀明显不同的探索旨在为世界居民创造空间以抵抗全球化时代资本的劫掠^⑧。

第三,毛泽东思想肯定了人的价值和意义。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人的生存意义和精神价值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在不断挑起人类的原始欲望。传统上基于个人主义的危机化解方式在面对资本逻辑的冲击时显得力不从心,而毛泽东对于人的境况的探讨则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路径。毛泽东在革命进程中充分认识到团结起来的人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可以战胜任何侵略者,创造“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为“全世界永久和平”作贡献^⑨。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

①Christina Van Houten. “Simone de Beauvoir Abroad: Historicizing Maoism an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015, 52(1): 112-129.

②吴冠军:《重新激活“群众路线”的两个关键问题:为什么与如何》,《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6期。

③吴冷西:《回忆主席与战友》,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0页。

⑦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7页。

⑧阿里夫·德里克:《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胡大平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下的人应该具有如下特征:对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充满信心,人和人之间身份平等,具有集体主义意识和艰苦奋斗精神^①。毛泽东强调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密不可分,该观点与个人主义针锋相对,为抵制资本逻辑、重建现代人的价值提供了新选择。

毛泽东思想中的三个维度对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资本文化逻辑具有积极意义。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毛泽东思想中的批判性资源局限于上述三点。本文旨在强调,理解毛泽东深层影响的基础是熟知毛泽东思想,并透过资本主义发展轨迹和弊病,重新挖掘和审视毛泽东思想,进而将相应的资源与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历史语境相结合,避免大而化之谈影响。

结语

全球史路径新视角兼具建构性与批判性特

征,对于深化毛泽东研究大有裨益。尽管目前西方学术界已有不少作品开始探讨毛泽东思想的全球史,但由于研究者缺少对毛泽东思想价值和意义的深层体认,其研究易于集中到某一类现象,得出的结论自然有失偏颇。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海外传播主要由中国推动,而毛泽东思想蕴含的批判性资源则为反思资本全球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学者理应为全球史路径下的毛泽东研究作出更多贡献。特别是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并存的当下,重新思考中国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超越国家边界的普遍性意义,或许能够在全球化趋势和地方多样性之间找到相契合的交汇处,而不是用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看待两种诞生于不同传统的发展脉络。全球史路径新视角下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Maoism under the Path of Global History

GUO Lin & ZHANG Fa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The global historical path is endowed with constructive and critical features by emphasizing the mobility of essential elements like thoughts and other informative resources through time, space and capital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s. Such path is illuminative to the study of Maoism from two aspects. The first is to re-examine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Maoism dissemination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xt types and disseminative channels. Second, it is to rectify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universal influence of Maoism. Deepening the study of Maoism under the path of global history helps to clarify the context of flow of Maoist thought and form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overseas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helpful to excavate the universal resources in Maoist thought, combining with local context to present value concerns, and on this basis,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patter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global historical path; study of Maoism; overseas dissemination; universal influence

(责任校对 唐尧)

^①张放:《毛泽东锻造社会主义新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2期。